

## 大陆赴港定居女性移民及家庭状况调查

## ——20例个案研究

郑桂珍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赴港定居的大陆移民家庭状况及其与妇女地位的关系。调查及研究的内容包括被访者的迁移原因、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家庭生活循环阶段、创业或发家过程、家乡认同、乡亲网络、自我认知、价值观等。调查对象为女性及其配偶。

1991年5~7月间,笔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自广东、福建、上海赴港定居的20个家庭采用入户观察、访谈的办法,了解了25~62岁被访女性的亲身经历、行为和观念,对香港大陆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初步研究。

## 一、基本人口特征

二次大战以后,香港经济急剧发展,社会富裕,就业机会扩充,商业发展,物质丰富,交通方便,具有极强的吸引力;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开了中国的大门,广东、福建、上海的一批受“南风”影响的“先知”者,纷纷申请赴港定居。被访20名女性(其中一人未婚)来自福建的有13人,来自上海的有6人,来自广东的1人。她们的家庭资料显示,这批移民在人口结构方面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移民的“先行者”,以青、壮年

男性为主。他们多数原出生于香港,后在内地升学和工作,或原系印尼、新加坡等国的华侨,后因“排华”、升学等原因回国。这些人有迁移历史,有亲友在海外,信息灵通。改革开放后,他们成了赴港定居心情最为急切的一批人。赴港“扎根”后,陆续携妻或返乡娶妻来“新土”安家。20名被访女性的平均年龄为41.15岁,变化幅度为25~62岁;配偶平均年龄为42.10岁,变化幅度为28~68岁。

第二,福建移民多来自农村地区,教育程度偏低,所调查的妇女中,小学比例占最高(57%),配偶则多数为初中水平。广东、上海赴港定居者则多为继承父业或受聘任教,受教育程度偏高,多数系大学毕业(见表1)。

第三,被访大陆移民家庭赴港时间短,世代延伸不足,家庭规模偏小。年轻一辈来港后,有经济独立能力,不用依靠父母,婚后可自行组织小家庭。加之香港住房紧张,无论住安置区、公屋或私家楼,居住面积都窄小,子女成婚后也只能另觅新居;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就业率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育观也有所转变,许多年轻人家家庭都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只生1~2个孩子,因而3~4

人家庭所占比例高。(见表2),多数为小型的核心家庭。有些赴港时间短的,仍过着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个别人来港时间虽长,为了儿女赴港,至今妻子仍留居内地;被访者

表1 调查对象及其配偶受教育水平

	硕士	大学	大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	合计
妻子	0	4 (20%)	1 (5%)	1 (5%)	1 (29%)	5 (40%)	8 (5%)	20
丈夫	0	7 (36.8%)	0	1 (5.2%)	8 (42.7%)	3 (15.7%)	0	19

表2 调查对象及其配偶的人口特征

家庭规模: (N=20)	生育子女数: (N=19)
1人: 1	1孩: 8
2人: 2	2孩: 7
3人: 7	3孩: 4
4人: 8	4孩: 0
5人: 2	

  

家庭生命循环阶段: (N=20)	
1. 开始阶段: 0	
2. 初育子女的家庭: 2	
3. 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 3	
4. 有学龄儿童的家庭: 5	
5. 有青少年儿童的家庭: 4	
6. 中年期的家庭: 3	
7. 老年期的家庭: 3	

家庭生命循环阶段多数属于育儿阶段,第二至第五阶段占70%以上,女性育儿及教育子女的负担较重。被访者的家居条件逐一改善,初赴港时,多数住“安置区”和木屋,现多数住私家楼。所调查的20户中,住私家楼的15户,住安置区的3户,住公屋的2户。

## 二. 职业及收入状况

被访者资料显示,这些大陆移民进入这个以“赚钱”为核心的高速运转、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创意的商业社会后,激起了强烈的进取欲,他(她)们一改“吃大锅饭”的“惰性”,舍命奋斗“赚钱”。福建、上海来的移民,首先得过语言关,他(她)们以学外语的劲头学习广东话。赴港经商的几家,尤其继承父业者,虽然经济基础好,但为求物质上、经济上的成就,也迅速熟悉港情,扩大联系面,钻研生意经,熟悉商情,生意越做越大,并进行各种投资,尽力争取更多的钱财;打工者在高薪水的激励下,更是起早摸黑,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干。他们相信,有机会、肯刻苦就有“出头”之日。被访者多数从业,任全天职。

在创“家业”的过程中,女性成了家庭的“主轴”。她们既要外出工作,同时又要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则或做家庭教师,或配合丈夫经商,管理帐务,帮助联系购销,照顾家庭。如一女性大学毕业,赴港继承父业,由于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事业有成,如今成了一个公司的副董事长,一个较大的国际贸易公司的经理;还有一女性,原系中学教师,来港后除了在业余学校执教外,又做起家庭教师,一天工作十几小时,收入颇丰;文化程度低的女性,为了照顾家庭,多数就近寻找职业。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一旦熟悉了业务,有了经济基础,则自立从商。

被访者家庭收入大都中等偏上,经商、任教者收入甚丰。其中2家甚至有余房出租(见表3)。

为了更快、更多、更有效地赚钱,他(她)们惜时如金,分秒必争,并具有很强的投资观念和市场观念。同时,他们也如同老香港一样,也想借助“上帝”和“神”的力量发财致富,被访者中10%的家庭信奉基督教,60%的家庭也都供奉“关公”、“财神爷”,望“天官赐福”!

香港地狭人稠,居住环境差。目前尚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付出了收入的大半作为租金,却只能住在一个拥挤不堪的房子里。初赴港的大陆移民一般都只能在安置区的木屋、龙屋里栖身,历尽艰辛。因此无论打工者、经商者、任教者,积钱购屋是他们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们物质上的一大成就。来港后的最初几年里,一方面舍命拼搏,争取高入息;另一方面,省吃俭用,许多家庭的吃、穿、用仍是由大陆带来的廉价物品。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大都能够购置私家屋,安居乐业。目前已有75%的被访家庭购买了私家屋,他(她)们常为拥有物业而自豪,且对香港产生了归属感、责任感,并具有了参与意识。

表3 调查对象及其配偶职业及收入状况

调查对象 (N=20)	配偶 (N=19)
<b>工作状况:</b> 全天职: 15人 (75%) (其中4人经商) 无工作: 3人 (10%) (其中2人因育儿 而暂停工作) 退休: 2人 (10%) <b>收入(港币):</b> 216: 2人 (10%) (国内之退休金) 2 500~3 000: 8人 (40%) 5 000: 2人 (10%) 8 400: 1人 (5%) 1~20 000: 4人 (20%) 无 : 3人 (15%)	<b>工作状况:</b> 全天职: 17人 (89.4%) (其中5人经商) 无工作: 1人 (5.3%) (原在美国任职, 回 港后不工作) 退休: 1人 (5.3%)  500: 1人 6000: 1人 1 0000~1 5000: 10人 20 000: 2人 30 000: 3人 无 : 0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被访的大陆移民家庭的物质条件也日益改善,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冰箱、摄影机、电话、厨房电器设备等,家家齐备,经商的几家,还备有“大哥大”手提电话、复印机、电传、录象机、音响等设备,家家充满了经济上、物质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 三、家庭稳定、夫妻关系较平等

被访的大陆移民家庭一般比较和谐、稳定。赴港的中老年夫妻,早年背井离乡,海外度生,解放后回国求学任职,历经政治运动,有些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同甘苦、共患难,感情至深;第二代年轻移民返乡求偶,条件优越,一般挑选称心满意并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婚姻满意度高,家庭稳定。在回答“您对您的家庭生活是否满意?”时,96%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而少数不太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居住条件差,生活太单调等。

如前所述,这些移民家庭为了很快在港“扎根”,夫妻双方都有强烈的进取欲。尽管子女幼小,妻子还是尽可能外出就业,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对家庭经济有较大贡献,因此在策划家庭事务时就有较大的发言权,

家庭的重大事务一般是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在回答“您家庭经济的主要决策人是谁”时,93%左右回答夫妻双方共同决策;7%左右有老人的家庭,老人也一起参与决策。即使入息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亦都不雇请女佣,子女幼小的双职工家庭,就得依靠老人帮助。那些“从子女居”的老年人一般也都受尊重,帮助照看第三代。

对于不同的家庭事务,妻子与丈夫的相对权力会有所不同。在商业活动等经济事务及社交方面,丈夫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大于妻子,而在家庭事务和抚养子女等方面,则妻子影响力要大。在策划和处理家务事时,丈夫多尊重妻子、老人甚至子女的意见。总的来看,被访者家庭依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俗,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于妻子,他被看成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妻子则为家庭的照顾者。但丈夫不再是家庭的绝对权威,家庭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经过家人的磋商和协议,在执行决策时亦尽力合作。

在商业气息浓厚,竞争激烈的香港社会,被访的大陆移民深感知识的重要。所以,这些家庭“望子成龙”心切,他们期望自己的子女成人后能以一种专长立足于社会,也可“光宗耀祖”。在回答,“在家中你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时,60%以上的女性回答“子女的教育或成就”,其次才是“家庭成员身体健康”。主妇致力于为儿女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他们对子女进入较高文化层次有强烈的追求。被访的中老年大陆移民,有些人已想方设法让子女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深造。

#### 四、困难和烦恼

被访者的资料表明,赴港大陆移民女性多数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在竞争中自我塑造,在家庭中实现男女平权。但是,由于女性在生理上与男子有许多迥异之处,月经来潮、怀孕生育、哺乳、绝经等,这些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现象构成了女性独特的生活道路,对其工作和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她们又自觉地操守着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她们中90%以上仍囿于传统,把家庭角色作为自己首要的责任;在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上,也总把希望寄托在丈夫和子女身上,为做丈夫、孩子事业上成功的“贤内助”而心安理得。她们的个性特征是在传统的女性气质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家庭角色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强化了她们“家庭主角”和“社会配角”的形象。在家庭里,她们掌管家庭经济,赡老抚幼、人情来往等一切家庭事务、家庭开支等都由她们支配。在社会上,他们则仍处于配角的位置,这表现为女性群体的职业结构低。为了照顾家庭,多数人只能在家庭附近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寻找职业,从事些最下层、最简单的工作。她们不能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从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更不过问政事,许多人在多重角色冲突中深受失去自我平衡之苦。

那些家庭生命周期处于第二、第三阶段的被访者,家务负担重,加上不熟悉香港社会环境,在抚育和管教孩子方面深感困难。有老人相帮的家庭尚好,没有老人帮忙的家庭,女性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同时由于香港托儿设施不足,移民家庭又无力雇保姆,她们在无选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工作。被访者大都有因结婚、怀孕、照顾子女而停工的经历,且时间也长,有时甚至持续2~3年,因而她们在工作上的“上进”心受影响,“投入感”多变,技术亦渐次生疏。在竞争性特强、工作方式和技能日新月异的香港社

会,女性选择职业和安排事业终处弱势。

被访者资料表明,赴港大陆女性一般担任着双重角色,在外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在家尽到主妇的责任。在家庭领域,两性分工依然沿袭着传统模式,妇女依然担任着传统角色,承担着绝大部分或全部的家务劳动。家务负重使女性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多地关心、接触、了解和思考家庭以外的广大世界,也就大大缩小了她们的视野,闭塞了她们的生活。同时,家务劳动负担过重也使她们很少或没有时间和精力读书、看报、参与社会活动,自身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她们对社区、对参与组织的兴趣低。所有被访女性都没有参加任何团体,也未参与任何公共活动,对区内的社会服务也没有认识,使用率极低。

#### 五、结论和建议

从20户个案调查资料看,赴港定居的女性都能努力工作、积极进取,有较强的归属感、责任感,人人致力于发家致富,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些大陆移民家庭仍受母体社会较深的影响,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抚育和赡养关系。这些小家庭在形式上从国内原大家庭中分离出来,但并没有完全割断与原有家庭的经济往来和情感上的联系。其特点之一是和睦、稳定,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和伦理意义,因而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地位比较平等,家庭关系比较稳固。

但是,香港虽然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但“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亦极深远,父亲被认定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是物质生活的供应者;女性则是“当然的家庭主妇”。被访的大陆移民家庭的女性,同样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角色陷入困境,强化了作为母亲、妻子、家庭主妇等的传统角色。她们的劳动参与率比配偶低,而且多集中于低技术、低地位、低薪酬的工作岗位,缺乏

(下转第49页)

兴旺。这里，孙中山仍然按传统的大国庶民的观点对马氏学说进行批判。

廖仲恺则接受英国近代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奠基者斯宾塞的观点，即个体发展的个性化过程同种族延续的生殖过程成反比关系；个体发展自己个性的精力同生殖力成反比关系。他依此批驳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人民的平均寿数”会高一些，但由于个性的发展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人们用于生儿育女的精力自然减少，因此中国将不会存在“人满之患”。<sup>①</sup>

即使一些人口节制论者，他们对马氏的人口理论也并非完全接受。人口学者许仕廉虽然对马尔萨斯的一些观点十分欣赏，但同时又认为“人口问题之全体，非仅为人口多寡之问题，凡人口之品质，经济之效率，与分配之平均，皆在其中。”他们已逐渐注意到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将人口现象仅看作自然现象而抹煞掉它的社会属性及社会生产方式给其的制约，力图在他的学说基础上作出更完整的解释。

从国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应可以看出，如同在思想界一样，人口理论方面也显

得繁荣纷杂，人们已经有能力在比较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甄别，而这种能力的形成，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对这些西方新思想新理论的了解和熟悉。从一些资料分析，在当时人口理论界，几乎对任何一种西方人口流派都不陌生，诸如生物学派的斯宾塞、数学派的法国人基雅尔以及美国人口学家凯莱、德国的沃尔夫等人，他们的学说与观点往往被中国的这些学者们信手拈来，从容论道。

尽管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思想十分丰富，但也显得纷杂，各种学说杂糅并进，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仅以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介绍和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无论赞同或反对者，都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发现马氏学说的真正实质乃在于为剥削制度辩护并反对任何社会改革。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在中国未能得到广泛传播所致，同时也与旧中国的人口学者受到当时社会条件 and 其所受教育环境的限制有关。

（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sup>①</sup> 《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廖仲恺集》。

（上接第53页）

培训、晋升和发展的机会。同时，妇女往往由于生育责任的牵绊而要中断工作生涯，个人事业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从被访的大陆移民家庭看，新移民家庭缺乏社区的指导和帮助，邻里关系淡薄，缺少互助，家庭主妇“忙透”，常被困难和烦恼所困扰，育儿阶段的家庭尤甚。

建议有关方面，第一，注重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六岁以下的幼儿提供一套统一的、质量并重的服务，聘用众多女性的机构应有儿童日托中心；第二，提高家务劳动社

会化程度，鼓励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及育儿的责任；第三，提倡建立亲切互助的邻里关系，睦邻互助，可减少不必要的问题发生，主妇们又可扩大生活圈子，开阔视野，增进生活兴趣，又可在紧急的时候，找到援手；第四，加强对这批女性的教育培训，提高文化及技术水平，拓展她们的知识领域，提高社会的投入感和参与能力；第五，加强对新移民的生活和社区指导，帮助她（他）们更快地适应环境，较平稳地度过适应期。

（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人口所）